



融通中西 · 翻译研究论丛



中国古代典籍日译研究： 以《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为例



▣ 芦晓博 杨晓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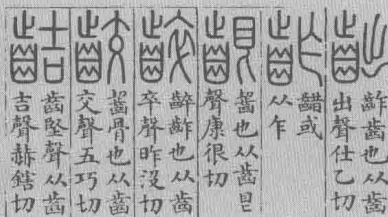
浙江大学出版社



融通中西·翻译研究论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古代典籍日译研究： 以《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为例



■ 芦晓博 杨晓波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典籍日译研究:以《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为例 / 芦晓博,杨晓波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10

ISBN 978-7-308-20700-3

I. ①中… II. ①芦… ②杨… III. ①古籍—日语—翻译—研究—中国 IV. ①H3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204470号

中国古代典籍日译研究:

以《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为例

芦晓博 杨晓波 著

责任编辑 张颖琪

责任校对 陆雅娟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虎彩云印刷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57千

版 印 次 2020年10月第1版 202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700-3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Z19JC093）成果

前 言

汉字是一种柔性的、可塑性很强的文字，几千年来抵挡住了各种冲击，满足了各个时代发展的需要。它经历了秦始皇的“书同文”、汉代的“隶变”、现代的简化，又成功输入了电脑，但它在当今仍然遭遇了新的危机。在信息化时代，我们与汉字打交道的方式变成了面对电脑或手机屏幕敲击或移动指尖，而一旦提笔，似乎对汉字就变得陌生了。诚然，时代在变。如今，讽籀书与善书法不再是加官晋爵的必要条件，而加官晋爵也不再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虽然忙于事务的现代人不得不学习传统知识以外的更多知识才能在社会立足，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坦然面对接受了比古人更多的教育，而识字与写字的能力反而退化了的窘境。汉字几千年来承载并延续着中华文明，它熔铸了中国人对宇宙与人生的看法，而我们往往对其“日用而不知”。因此，受现代教育者虽未必个个书法精湛，小学精通，但确有必要对汉字的起源、构造、演变等方面的知识有基本的了解，并认识到汉字的独特与伟大，从而获得一种文化上的自豪感与归属感。

汉字源于中国，书法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因此，汉字与书法文化的译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日本是当今世界“汉字文化圈”的主要国家之一，它不但沿用了大量汉字，还继承了基于汉字的书法文化（称为“书道”）。因此，汉字与书法文化的日译实践与研究对加强中日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典籍东传日本的历史较之西渐更为悠久，译介成果也更多，重要典



籍都已由精通汉学的日本学者译介到了日本。然而,中国典籍日译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研究却较少。本书以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为例,探讨了中国典籍日译的方法与策略,并将该文本进行了“深度翻译”。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中国典籍日译的理论探析。第一章探讨了中国典籍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这一经典话题,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思想为依据,论证了翻译的可译性,并揭示了这部哲学名著为翻译学带来的启示;第二章从中日语言的特点谈起,探讨了日本的“国字”构形与汉字“六书”造字法的联系,以及“和制汉语”这一特殊的“翻译”现象。下篇为《说文解字叙》的日译实践。第三章是《说文解字叙》以及现有日译本的概述;第四章提出了《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模式,为后文的“深度翻译”实践提供了指导;第五章提出了典籍术语日译的新方法——“训译”,并以《说文解字叙》中“六书”名目的翻译为例,证明了“训译”在术语翻译中的有效性;第六章为《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实践,包括对该文本的解说、注释(中、日文)与翻译(翻译为日语与现代汉语);第七章分享了本书的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在我教授的日语MTI课程“中日语言对比”中的应用,以及该成果对日语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教育的启示。本书附录提供了重要术语汇总(中、日、英对照)与《说文解字叙》的原文及英译,并附上《中国书法发生论刍议》与《释〈续书谱〉中的“八法”》两篇文章供读者参阅。书中所有图片均为笔者亲自拍摄,大部分为2019年10月在河南、陕西调研时,于中国文字博物馆、殷墟宫殿宗庙遗址、西安碑林等地拍摄。

本书的构想最初是由合作者杨晓波老师提出的,但他由于忙于其他研究而无暇完成此项工作。在我动笔前,他已完成了《说文解字叙》的中文概说、注释、今译、解说以及英译,其余部分均由我独立完成。由于杨老师的研究开始得早,积累比我深,因此我在写作过程中时常向他请教。

本书的部分章节曾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多种刊物,收入本书时均有不同程度的修订。这些成果得益于我与杨老师的学术探讨,大部分是他提供的选题,而文章则均由我执笔完成,他审阅后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书中第一章第二节曾以《论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翻译思想》为题发表(载《英语教师》2018年第3期,作者:芦晓博),第二章第一节曾以《日本国字构形

与汉字“六书”辨异》为题发表(载《现代语文》2019年第4期,作者:芦晓博、杨晓波),第二章第二节曾以《“和制汉语”翻译的理据分析》为题发表(载《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作者:芦晓博),第四章曾以《中国典籍的“深度翻译”模式探究——以〈说文解字叙〉为例》为题发表(载《英语广场》2019年第11期,作者:芦晓博、杨晓波),第五章曾以《论中国典籍术语的日语训译——以“六书”名目的翻译为例》为题发表(载《浙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作者:芦晓博、杨晓波),第七章曾以《基于〈说文解字叙〉释、译的MTI“中日语言对比”课程探索》为题发表(载《教育现代化》2019年第87期,作者:芦晓博、杨晓波),附录中的《说文解字叙》英译曾发表于傅君恺(Carl Fordham)博士主编的网络期刊《温墨》2020年第1期(该期刊编辑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此外,为加深读者对汉字书法艺术的了解,我们在附录中收录了两篇相关论文:《中国书法发生论刍议》(载《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作者:芦晓博、杨晓波)、《释〈续书谱〉中的“八法”》(载《中国书法》2018年第24期,作者:芦晓博、杨晓波)。在此,谨向曾对上述文章提出过宝贵意见的专家及编辑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为本书中的日译提出过宝贵意见的日语资深外教西川昌芳老师。当然,因我们学识有限,书中对《说文解字叙》的阐释、翻译及翻译研究定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祈方家不吝赐教!

本书系2019年杭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说文解字叙》的日译研究与实践”(编号:Z19JC093)的结题成果。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出版基金的资助,以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的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芦晓博

2020年春于杭州

上篇 中国典籍日译的理论探析

第一章 中国典籍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3
第一节 可译,还是不可译	5
第二节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可译性启示	8
第二章 从中日语言关系的特点谈起	16
第一节 日本“国字”与汉字“六书”	17
第二节 和制汉语与“翻译”	25

下篇 《说文解字叙》的日译实践

第三章 《说文解字叙》与其现有日译本	35
第一节 《说文解字叙》的主要内容与学术价值	35
第二节 《说文解字叙》现有日译本概述	51
第四章 《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模式探究	54
第一节 关于“深度翻译”	54
第二节 《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	56
第三节 “深度翻译”的未来发展	58



第五章 《说文解字叙》核心术语的日译探析	60
第一节 中国典籍术语日译的方法	60
第二节 “六书”名目的日译	62
第六章 《说文解字叙》的“深度翻译”实践	71
第一节 汉字的起源	71
第二节 汉字的构形	84
第三节 汉字的字体:秦代	92
第四节 汉字的字体:汉代	102
第五节 编书的初衷	114
第七章 《说文解字叙》的释与译对日语 MTI 教育的启示	132
参考文献	139
附录 1 重要术语汇总(中、日、英对照)	145
附录 2 《说文解字叙》原文及英译(杨晓波译)	156
附录 3 中国书法发生论刍议	165
附录 4 释《续书谱》中的“八法”	172
索引	178
后记	181

图目录

图 3.1 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的许慎头像	35
图 3.2 “六书”之传承	38
图 3.3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2012 年版)	39
图 3.4 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的善夫吉父霁盖上的铭文(西周晚期)	42
图 3.5 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陈列的甲骨文	44
图 3.6 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的新石器时期陶器刻符	45

图 3.7	秦统一前“马”字的不同写法(拍摄于中国文字博物馆)	47
图 3.8	甲骨文发现地:殷墟	48
图 6.1	传说中的仓颉像(拍摄于中国文字博物馆)	72
图 6.2	中国文字博物馆陈列的李斯峰山刻石拓片	92
图 6.3	汉隶典型的“蚕头雁尾”(杨晓波示范)	103

表目录

表 2.1	中日学者对国字按“六书”进行的分类	20
表 4.1	《说文解字叙》三译本的“深度翻译”模式对比	57
表 5.1	“指事”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笔者的释译与训译	64
表 5.2	“象形”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笔者的释译与训译	65
表 5.3	“会意”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笔者的释译与训译	66
表 5.4	“假借”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笔者的释译与训译	66
表 5.5	“转注”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笔者的释译与训译	68
表 5.6	“形声”的许慎释文、现有释译及笔者的释译与训译	69
表 6.1	“长”“斗”“虫”三字的甲骨文、小篆与隶书	123
表 7.1	“中日语言对比”教学设计	135
表 7.2	“六书”名目的训译	138

上篇

中国典籍日译的理论探析

第一章

中国典籍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中国典籍数量繁多,涵盖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核心价值观。21世纪初,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了解这个东方古国的传统文化,而我国也希望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沟通,树立文化自信。可以说,中国典籍翻译对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是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主要途径。

中国典籍翻译始于16世纪末,西班牙传教士胡安·科沃(中文名:高母羨)将明朝范立本辑录的儿童启蒙通俗读物《明心宝鉴》译成西班牙文。直到18世纪,来华传教士将我国大量的典籍译成外文传播到世界各国,掀起了典籍外译的第一次高潮。近代,以我国学者为翻译主体的典籍翻译活动逐渐展开,如辜鸿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论语》《大学》《中庸》等、林语堂于20世纪30年代编译《浮生六记》《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改革开放后,中国典籍翻译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81年由杨宪益倡议出版的“熊猫丛书”^①与1995年正式立项的“大中华文库”^②。“大中华文库”是原

① 当时英国出版发行的“企鹅丛书”在各地畅销,出版社纷纷效仿出版以P字母开头的丛书,“熊猫”同样以字母P开头,因此取名“熊猫丛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将中国的优秀作品译成英语、法语,也有少量的德语和日语。

② “大中华文库”是我国首次以中外文(包括英、法、俄、西、阿、德、日、韩等语种)对照的形式,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广中国典籍、弘扬传统中华文化的重大出版工程。其中涵盖了历代文学、历史、哲学、军事、科技等领域的代表性典籍。截至2018年,已出版170多部作品,先后有30多家出版单位参与其中。



新闻出版署立项的国家图书出版规划重大工程,汇集了我国翻译学界高水平的译者。此外,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对照中国古典名著丛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大师经典文库”、外文出版社的“汉英经典文库”等系列典籍翻译作品亦相继问世。

近年来,中国典籍翻译尽管在数量上和规模上都有了显著的提升,但学界对其所起到的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纷纷提出了质疑。汪榕培在第三届全国英译研讨会上指出,目前从事典籍英译的队伍数量和作品质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①从传播途径来看,目前国内典籍翻译的出版发行多数限于国内,难以走出国门,有些译作甚至成了“出口转内销”的产品;^②谢天振在《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一文中指出,“熊猫丛书”与“大中华文库”并未获得预期的效果,尚未真正将中国文化“传出去”。^③对此,已有学者进行了反思,如王宏印指出,典籍翻译尚存在三个问题:(1)偏重儒家典籍翻译;(2)偏重先秦典籍翻译;(3)偏重汉民族和汉语文化典籍翻译,以及局限于诗歌和小说等文学艺术的典籍翻译,而对艺术理论翻译的关注还不够,如书法理论、戏剧理论、绘画理论等。^④此外,近年来典籍翻译的理论研究多集中于翻译标准、语言分析等“老问题”上,“这是典籍翻译理论研究极为缺乏的一个状态”^⑤。

近年来,我国的典籍翻译虽然成果斐然,但尚存在翻译文本的选题不够均衡,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宏观的理论指导等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翻译的语言表达,以及翻译策略等具体的翻译实践问题,更应回答中国典籍究竟能否翻译这一基本问题。

① 汪榕培:《为中国典籍英译呐喊——在第三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上的发言》,载《中国外语》2006年第1期,第66页。

② 王宏印编著:《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③ 谢天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载《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第1—10页。

④ 王宏印:《典籍翻译,任重道远——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问题与思考》,载《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2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82—283页。

⑤ 王宏印:《典籍翻译,任重道远——关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的问题与思考》,载《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暨2012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92页。

第一节 可译,还是不可译

“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一直是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也是翻译学的基本问题。方梦之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中,“可译性(translatability)”词条的释义为:“与‘不可译’相对,指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之间,通过翻译,可以将源语文本或单位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实现使用两种不同语言的人群对同一个事物的理解。”^①我国学者贺麟在《论翻译》一文中从哲学的角度阐释了可译性论:“今翻译的本质,即是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以表达同一的真理,故翻译是可能的。”^②金岳霖在《知识论》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所思都是普遍的。普遍的意念无分于特殊的时空,当然也无分于不同的语言文字或引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③唐述宗从统计学角度指出:“如果采用统计学的方法统计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翻译实践中遇到的不可译现象在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以下。而从概率论的角度,百分之九十九这个数字已足以得出‘语言是可译的’这个结论。”^④左鹰以中国特有的“龙”的翻译为例,尝试挑战学界根深蒂固的“文化不可译论”。^⑤可译性论的理论基础在于我们生存的客观世界是同一的,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具有普遍性,而不同的语言是人们认识这同一客观世界的思维的表达,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两种不同语言间的转换是可以实现对同一世界或思想的表达的。

然而,我们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切身感受到了翻译的种种困难,与可译性相比,学界似乎更加关注不可译性中的种种因素。在《中国译学大辞典》中,“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词条的释义为:“与‘可译性’相对,指译文不可能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卡特福德(Catford)在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中将不可译性分为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语言不可译性是指在语言形式方面,目的语与源语文本

① 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贺麟:《论翻译》,选自《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③ 金岳霖:《知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4页。

④ 唐述宗:《是不可译论还是不可知论》,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第57页。

⑤ 左鹰:《论文化的可译性》,载《上海科技翻译》1999年第2期,第1—6页。



无法对应；文化不可译性指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不可译性。”^①意大利谚语所谓的“翻译者即叛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可谓不可译论的先声。意大利诗人但丁首次提出文学作品的不可译性，他认为，任何富有音韵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原有的全部优美与和谐。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在《堂·吉珂德》中借主人公之口将翻译比作从反面观赏佛拉芒毯，其图案轮廓固然可见，但正面清晰、平整、斑斓的色彩则全然不见。法国的伏尔泰曾认为，翻译增加一部作品的错误并损害它的光彩。法国的狄德罗指出，各种语言结构上的差异使翻译原则上不可能，因为某种语言独有的境界本身即语言的精髓总是要失掉的。德国的洪堡特认为，任何翻译毫无疑问都是试图完成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每个译者必然要撞到两个暗礁中的一个而碰得头破血流，或者过分恪守原作而损害本国人民的审美习惯和语言，或者过于照顾本国人民的特点而损害了原作，要找出某种折中的办法不仅困难重重，而且简直是不可能。德国的施莱格尔将翻译比作一场拼死拼活的决斗，最后遭到失败的若不是译者，就一定是原作者。^②美国学者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尔夫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即：在不同文化下，不同语言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和使用等方面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其中包含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则。前者强调语言决定思维，后者强调操不同语言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感知、思考和认识世界。可以说，“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为“不可译性”提供了强大的语言学支撑。^③持不可译论的我国学者主要从汉语语言的独特性出发，认为中外语言乃至各个文化间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导致翻译的不可能。如杨衍松在《古老的悖论：可译与不可译》中指出，汉外互译中，由于缺乏内涵和外延的等值关系，汉外文字之间无法实现内容与形式在字面与功能上相互转换的情况比比皆是。汉语因其特有的图像性、会意性和联想性等，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得到传达，甚至根本不可译，如对联、析字、藏头诗、绕口令、歇后语、成语等，以及律诗中的平仄、对仗等。^④王宾以李白的《静夜思》为例展示了语言结构转换的不可能性从而论

① 方梦之主编：《中国译学大辞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② 参见：杨衍松：《古老的悖论：可译与不可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9期，第51页。

③ 参见：王宾：《“不可译性”面面观》，载《现代哲学》2004年第1期，第83页。

④ 杨衍松：《古老的悖论：可译与不可译》，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年第9期，第53页。

证了不可译性。^①

与上述主张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绝对对立的翻译观相比,更多的学者主张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相对关系,即“可译性限度”(limit of translatability)。正如卡特福德所说:“可译性的确似乎是一个连续体(cline)而不是一个明确的二分体(dichotomy)。源语文本和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可译的(translatable)或不可译的(untranslatable)。”^②国内学者如刘传珠、唐述宗、田庆芳、蔡龙全等也持有同样的观点。^③目前翻译学界普遍认同翻译的相对可译性,相关研究与前两者相比视角更为多样,内容更加丰富,在此我们不加赘述。

综上所述,关于可译性问题,绝对不可译论者多于绝对可译论者,而学界普遍认同可译性存在一定的相对性。我们认为,尽管在各种文本的翻译实践中或多或少存在语言或文化的不可译性,但面对如今信息时代背景下人们交流需求激增的现状,翻译研究的导向应注重其可译性,我们不仅要聚焦翻译方法与策略的研究,以及从事大量的翻译实践,更应从宏观的视角出发,以翻译的核心为前提,为可译性寻求更加可靠的理据。

语言是翻译活动得以成立的条件,探讨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实质是探讨语言的可说与不可说的问题。谈起语言的可说与不可说,便绕不开20世纪西方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奥地利的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1951年)。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被学界通常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两个时期的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与《哲学研究》提供了两套并不相容的语言观,更确切地说,是通过语言观察世界的不同方法。相比于前期思想,其后期思想在语言学,尤其在语用学领域影响较大。因翻译学的一部分归属于语言学,故不少翻译研究以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为视角来探讨翻译,而以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为视角的翻译研究则较为罕见。事实上,《逻辑哲学论》中有多处谈及翻译的段落,这些段落

① 王宾:《论不可译性——理论反思与个案分析》,载《中国翻译》2001年第3期,第8—16页。

② 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穆雷译,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

③ 参见:刘传珠:《可译性问题的语言功能观》,载《中国翻译》2000年第1期,第31—34页;唐述宗:《是不可译论还是不可知论》,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第54—57页;田庆芳:《语言的不可译性与文化的不可译性比较》,载《上海翻译》2007年第2期,第47—51页;蔡龙权:《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关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道德思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16—125页。